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生逢乱世】	学部知识分子“文革”众生相	孟祥才
【荒唐年代】	“新时代的狂人”陈里宁	林 焱
【研究报告】	内蒙东部“温和土改”与乌兰夫的文革倒台（下）	程惕洁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生逢乱世】

学部知识分子“文革”众生相

· 孟祥才 ·

〔作者简介：孟祥才，山东大学教授，1964年作为研究生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文革中，孟祥才是历史所造反派核心成员之一。——编注〕

经历过“文革”的人们，知道耳熟能详的“文革”话语是很多的。其中一句话是：“文革”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句出自林彪的名言，的确道尽了人们面对“文革”的酸甜苦辣。在中国大陆，无论什么人，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各级党政官员，从各行各业的大、中、小知识分子到大、中、小学的学生，从军队的官兵到公安干警，从国营大企业的工人到穷乡僻壤的农民，无论什么人，无论何地，都无一例外地卷入了“文革”的进程之中，都必须展现自己对“文革”的因应之道，因而也就在最大限度上展示了各自的政治人格、德行品位、情操心态、喜怒哀乐。由于学部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最高档的研究基地，聚集了当时一大批文化知识精英，他们“文革”中千人千面的精彩表演，活画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儒林史”。

因为学部的领导绝大部分都有大学甚至留洋的学历背景，这里也将他们归入知识分子行列一并记述。

学部领导潘梓年、关山复、刘导生、张友渔、杨述、姜君辰，还有被废黜而安插于学部的张闻天、杨献珍等，以及各研究所的主要领导，基本上都有大学甚至留洋的学历背景。所以，他们一方面是久经党内斗争历练的高级干部，一方面仍然具有知识分子的特质。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虽然主要展现革命老干部的持重与沉稳，但有时也展露知识分子的善于思考、敢于直言的品貌。但是，由于“文革”的“史无前例”，他们此前在党内斗争中积累的经验难以对“文革”应付裕如，所以“文革”一开始，他们都被打得瞠目结舌、晕头转向、不知所措，陷于被动。因为他们过去基本上都是历次运动的领导者，控御者，整人者。现在突然成为被整者，所以一时很难适应。不过，他们毕竟有着丰富的党内斗争的经验，因而能够很快调整心态，在谨言慎行的前提下尽量紧跟。在被批斗时能够“正确对待群众运

动”，决不强硬对抗，而是顺从地接受批判和质问，得体地回答问题，有选择地承认错误。他们大都能沉着应战，很少有惊慌失措的时候。潘梓年被拉回学部批斗时，双手紧握于胸前，沉着地慢声细语地回答所有问题，拒绝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张友渔不仅自己顺从地接受批斗，还耐心劝诫自己的夫人“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杨述更是低眉顺眼地服从群众的批斗。不过，一旦看准有利形势，他们也能不失时机地亮明自己的观点。如刘导生就言之凿凿地证明潘梓年与他“没有路线分歧”，学部的问题和责任潘都是有份的。何其芳就敢于站出来与清查“五一六”积极分子进行斗争，刘大年对清查“五一六”运动就不赞一词。历史经验使他们坚信，“文革”运动终有一天会结束，党组织一定会将正确的政策落实到他们头上。实际上，他们总的倾向是反对“文革”，对造反派深恶痛绝，在有机会惩治造反派时他们是决不手软的。所以后来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他们大部分人都是积极拥护，有条件者更是积极参与。他们的报复心态得到赤裸裸的展现。也有一些老干部，在此前的运动中被错误整治过，他们对挨整看得开，对运动采取游戏人生的态度。如历史所的高全朴，面对批斗入监狱也毫不在乎，入则不惧，出亦不喜，一切都无所谓。因为他对犹如家常便饭的运动已经看穿了。在整个运动中，学部的老干部没有一个自杀身亡的，这说明他们有足够的经验、智慧和能力应付运动，按照“四清”运动中的说法，他们是属于“红毛兔子、老狐狸”式的人物。

学部知识分子的主体是专业研究人员，这些人中，非劳动者家庭出身者多，非党员多，学术权威多，业务尖子多。他们因应“文革”展示的人生百态，构成了学部知识分子最光怪陆离的图画。这些人可分多种典型。

第一种是以死抗争的刚烈型。这种人大都是性格刚烈、清纯无邪、疾恶如仇、笃信执着，眼里容不进沙子。他们绝对相信共产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相信共产党的各级官吏都是明如水，清如镜的清官。相信“文革”运动一定如共产党屡屡宣示的，既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然而，现实却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当莫须有的罪名硬加到他们头上，当脏水无端泼到他们身上，当他们信仰的圣殿轰然倒塌，他们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不惜以死抗争。历史所的杨超，虽然出身于上海的资本家家庭，但解放后一直无条件地追随共产党，执着于自己的专业，在自己并不富裕的条件下，毅然将母亲留给自己的5万元现金捐给国家。如此矢志忠心，如此肝胆赤诚，得到的结果却是一顶他自己根本不知何物的“五一六”帽子。他在对一切绝望后毅然喝敌敌畏自杀。放在衣兜中的纸条上写的是“我不是五一六，我也不知道谁是五一六”。哲学所有一个姓朱的年轻人，20多岁，性格内向，业务很好。“文革”开始不久，他倾向造反派，曾在联队的资料组工作过。我作为资料组负责人看到，在“文革”议论横生的日子里，他几乎不参与我们的议论，也几乎不同我说话，只是默默地完成我交给他的工作。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他也成为清查对象，面对这种无端飞来的横祸，他选择了卧轨自杀。其惨状目不忍睹。还有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年轻人甘庆元，是我们一派的骨干分子，业务尖子。他被诬陷为“五一六”分子之后，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从六楼飞身而下，脑浆崩裂，惨不忍睹。

这些性格刚烈者，以自己的惨烈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他们不愧为捍卫自己人格的英雄。然而，他们牺牲得值得吗？我怀疑！你面对的，既不是日本鬼子宪兵队，也不是国民党的中统军统特务，而是手握红头文件的工军宣队，是共产党的执政团队，你为捍卫真理而毅然赴死，他们不给你一个“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罪名就算高抬贵手了，绝对不会承认你是什么英雄。你的死只能给你自己和家人带来损失和痛苦，实在太不值得了。不过，他们的死仍然值得崇敬，因为他们以自己惨烈的死昭示了这个体制的非人道，昭示了“文革”的荒谬绝伦。

第二种是以死抗争绝望型。如近代史研究所的尹士德，是与我同届的研究生，也是我们一派的骨干分子，业务极其优秀。“文革”中，他怀着对毛泽东的无以复加的崇拜心情，收集了一部分毛泽东未发表的著作，编辑印刷成册，赠送和卖出数以千册，目的是满足大家学习的需要，我也保有一册。但是，由于流传于社会上的毛泽东著作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文字也不尽相同。尹士德在编辑时对个别文字做了一些改动。谁知到我们一派垮台的时候，他被总队抓到法学所关了起来，威逼他承认“反毛泽东思想”。这在当时可是弥天大罪。而这对于一个对毛泽东思想无限忠诚的青年人来说自然是无法接受的。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在逃出法学所的监禁地之后，跑到一个建筑工地，在铁丝网上搭绳上吊自杀。历史所的赵国华，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季羨林的得意门生之一。他被诬陷为“五一六”分子之后，上吊自杀，所幸解救及时，喉头缝了三针，捡回一条命。外文所的一个双腿瘫痪的业务尖子，也在被诬陷为“五一六”分子后在自家住的房间内上吊自杀。他将自己使用的拐杖横架在两个柜子中间，搭上一根绳子，轻而易举地走向不归路。

这些绝望型的自杀者，都是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无法承受，对未来前景悲观，在极度痛苦中以求解脱。这些人大多是文弱书生，没有经过政治上大风大浪的锻炼，经不起挫折。如此弱者的死亡，更彰显了体制的残酷无情：逼使一个对你毫无危害他人能力的人选择死亡，这是何等残忍与无情！

第三种是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不屈不挠的坚定抗争型。他们意志顽强、宁折不弯，面对强权和威胁，面对诬陷和各种迫害，认定“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无所畏惧，敢于抗争。经济所长孙冶方，先是在1964年被点名批判，罪名是鼓吹价值规律。接着在1968年被关进秦城监狱7年。但他“不认罪”“不改志”，仍然研究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历史所魏明经先生，已经近60岁，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诬陷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他据理力争，坚持认为自己参加1928年的北伐之役是“革命行动”。历史所傅崇兰，被捕入狱，双手被反铐起来达一月之久，由于血脉难以流通，胳膊淤血青紫，始终不承认诬陷的各种罪名。历史所的王真，被诬陷为“五一六”分子，长期关押监禁，始终不承认诬加的罪名。历史所王冶，是在监禁状态下挨打最多的一个人，面对批斗他“五一六”罪行的积极分子，他当场叫板，让他们拿出证据来！历史所步近智、沈定平、蒋忠新、向祥海等同样顶住压力，拒绝承认“五一六”的污名。近代史所徐辉琪更是一条硬汉，他经历了七天七夜不间断的车轮战，硬是顶住了几乎超越生理极限的迫害，没有自污为“五一六”分子。同是近代史所的郭永才，被诬陷为“五一六”分子，在批斗会上，与动手打他的工宣队员和清查积极分子扭打在一起。最绝的是语言所的周若瑜，他不仅拒绝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而且指出自污为“五一六”分子并当场指证他是“五一六”分子的人也不是“五一六”分子，而是被逼无奈自污。这些人在运动中少之又少，他们是经受住严峻考验的英雄。面对他们，专案人员和清查积极分子束手无策。

这些人在运动中为坚持真理和事实求是原则付出了沉重代价，唯其如此，他们才成为“文革”中的亮点。

第四种是面对压力违心屈服但准备适时翻案型。“文革”这这类人数最多。如历史所的何兆武先生，他因为讲了几句议论江青的话被逼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可他知道，这个罪名终究是虚构的，时机一到，必然翻案。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大部分被诬陷者都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并按照诱供指供的要求交待自己的所谓罪行。这些人或神经脆弱，或身体孱弱，抱着“光棍不吃眼前亏”的自保目的，接受诬陷的罪名。这些人后来虽然都被宣布无罪，但事后都感到对别人的亏欠，因为他们在自污的同时，也将别的无辜者牵连进来。我自己就是被污又自污的一个人，在车轮战下，被逼承认他们给予的“五一六”政委的头衔和一系列的罪名。平反以后，我觉得无颜面

对昔日的同事和朋友。这类人的自污，从一定意义上看不失为一种生存技巧。北京医学院一个朋友告诉我：北京医学院的党委书记是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张彦的夫人。她在“文革”运动中被造反派诬陷为“叛徒”，因为按照“文革”逻辑：被捕即叛徒，在国统区工作学习即特务，出国留学或访问即里通外国，她在被逼、供、信的条件下承认自己是“叛徒”。事后查实，她不是叛徒。专案人员气急败坏，问她：“你不是叛徒，为什么承认？”这位老太太回答：“我不是叛徒，你们为什么逼我承认是叛徒？我承认你们给我妄加的罪名，是还想活下来继续跟毛主席干革命哪！”专案人员无言以对。

第五种是一切顺从型。这些人在运动中顺从地承认所有妄加的无论真假的罪名，几乎不辩解，更不对抗，低眉顺眼，俯首贴耳，是主持运动者最喜欢的人群。这些人中，又大体可分两类。一是确有罪行和问题，如当过汉奸，历史所的谢国桢、高志辛、谢家、王竹楼即属此类。如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做过官吏，够得上“历史反革命分子”者。如1957年被打成右派者。这些人明白自己永远是另类，属于专政对象，必须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才能争取一个较好的出路。二是没有什么问题，但硬是有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加到你头上，教授级的研究人员也就顺从地接受了。如历史所的顾颉刚先生，开始很难接受，继而勉强接受，再后来是心安理得地接受，最后竟觉得这个头衔也是一种身份，在学术上与他不能比肩者不应该获得这个头衔。

一切顺从型人群的出现，说明体制已经将这类人改造到何等程度！

第六种是玩世不恭、游戏人生型。这类人虽然是少数，但是特别突显明亮，让执政者哭笑不得。历史所的高全朴算是此类人中的一个典型。大概由于屡经战阵，他能沉着应付所有场面。如1942年整风，他被抢救成“特务”，他于是把所有自己从事的革命工作全部写成特务活动。在历史所对他的批斗会上，他对答如流，态度惊人地老实，对“攻击旗手”的罪行“供认不讳”。只是在被追问“反动目的”时一时语塞，稍稍考虑后，痛快地回答：“我想影响青年人跟我走。”其实他杜撰的这个理由可笑至极：你想，当时的江青正红得发紫，造反派“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的口号正喊得摇天撼地，有那个青年人敢跟“攻击旗手”的人走？事后他对我说，我没有编造江青的任何材料，我说的都是事实，这难道也算攻击？在秦城监狱，他吃得饱，睡得着，出狱后显得身广体胖，神采奕奕。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一些被诬陷为“五一六”分子者，故意交待清查积极分子是“五一六”，让工军宣队和清查积极分子们乱了阵脚。历史所最大的玩世不恭型应该是王恩宇，此人身上展现出很明显的流氓无产者气质，对什么事情也满不在乎。他亲口告诉我，进入秦城监狱后，他竟在一次对他审讯时睡着了，惹得审讯者大为光火。有知情者说，他在监狱中竟然开出300多人的“五一六”分子名单。他开出的这个大名单对清查“五一六”运动起了很坏的作用，在他自己却得益自己的杰作：给运动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出狱后，他仍然满不在乎。在检查自己的错误时，傅崇兰比较有分寸，不以痛骂自己、故意给自己扣大帽子乞求谅解。他则将自己说成十恶不赦的“反革命”。一次，他私下对我说，傅崇兰老是为自己辩护，他们自然不高兴。你就把自己说成是“反革命”又怎么样？难道真的就成了反革命？他如此这般地自污最后并没有得到谅解，还是被定为“三种人”，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对如此严厉的处分，他根本就不应该签字承认，但他却顺从地签字承认。他的玩世不恭给自己带来的永世不得翻身的恶果。

第七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冷眼向洋、若即若离的逍遥型。这一派在“文革”中人数较多并且越来越多。这一派的骨干分子是专业人员中的非工农、革干出身的人，普遍读书较多，学问做得较出众，被党员和积极靠拢党组织的人认定为走“白专”道路的人。在运动中，他们既不造反，也不老保。从不旗帜鲜明地展示自己的立场，那派当权就随那派活动，在不断翻转的派系斗争中，一些投机色彩浓重的人物，总是处在“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

队，做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的状态下，而他们却没有这类烦恼，因为他们总是在大势不定时沉默，在大势已定时表态，从不表现慷慨激昂、大义凛然。这一派人很为造反派积极分子和保皇派积极分子看不起，认为他们不关心国家大事，将他们归入于落后人群。其实，这些人是最聪明最理智的群体，也是在“文革”中最少受害损失最小的群体。他们一开始就较清醒地认识到“文革”的荒谬之处，头脑冷静，拒绝狂热，坚决不趟浑水，采取可贵的明哲保身之策。这些人中又分几个层次。一部分高研，在被批判一阵之后，轻松走入这一群体，随波逐流，随遇而安，继续读书做学问。一小部分中青年，充分利用别人“干革命”而自己余暇多多的机会，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认真读书，沉潜思考，在学问上孜孜以求，厚积薄发，“文革”后很快在学术上展露头角。也有一部分人刻意经营小家，打家具，逛市场，收购文物，将小日子过得滋滋润润。运动过后，那些拼命投入“文革”，特别是造反派的人们才恍然大悟：最聪明的是这些逍遥派，最愚蠢的是自己这些“造反派”，因为他们除了遍体鳞伤外，什么也没有得到！

历史所逍遥派中有几个典型人物。

高研中的杨向奎、张政烺、胡厚煊、贺昌群、谢国桢、王毓铨、魏明经是他们这一层次的代表。他们在运动中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尽管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大会小会挨过几次批斗，也戴着帽子在学部大院游过一两次街，但很快处于宽松闲置状态，人身自由基本上不受限制，可以读自己愿读的书，思考自己有兴趣思考的问题。“文革”结束后，除早逝者外，不少人在业务上取得进展，出版了一批专著。

中青年中的逍遥派以李学勤、张岂之、陈高华和王增瑜为代表。他们虽然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但属于解放后国家培养的大学生，作为业务尖子一直被看重。他们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他们既不整人，也未挨整，与两派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除了参加必要的活动外，他们将主要精力用于读书，认真钻研业务。与积极投入运动的人相比，他们基本上没有荒废学业。由此与同辈在业务上拉开了较大距离。“文革”结束以后，他们很快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出版了不少有份量的学术著作，发表了数量可观的有影响的论文，以骄人的业绩成为蜚声中外的学者。何兆武先生尽管遭受天外飞来的横祸，因与朋友的一次私人谈话而罹难，但他基本上属于逍遥派。除了在罹难期间遭受屈辱外，他大部分时间还是能够闭门读书，沉潜思考。他在“文革”后经历了自己生命的辉煌期，以众多高质量的论著赢得了中外学术界的赞誉。

在十年“文革”中，真正有眼光、能自持，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住自己命运的人是这些逍遥派。他们以自己的理性、睿智、勤奋、执着，证明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第八种是挖空心思的整人专业户型。这批人大都有着党员的头衔，在历次运动中有着出色的表现，他们对运动有特殊的偏好和执着，仿佛为运动而生，为运动而活，一遇运动，即如春水充溢池塘时的青蛙，咯咯而鸣，兴奋不已。他们特别热衷运动，擅长在运动中紧跟上级步伐，能够创造性地整人，无中生有地办案。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这些人的才能和智慧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他们硬是把没有“五一六”一兵一卒的学部整成“五一六的”操纵者、组织者、黑据点、大本营，硬是让文弱书生编造出进行“反革命政变”的计划，让他们成为进攻中南海、绑架毛主席的突击队。在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揪住无辜者不放，硬是给无辜者凭空加上几多莫须有的罪行。他们明知道自己在制造冤案，但依然昧着良心制造下去。他的名言是：“什么真的假的，给你戴上帽子就是真的！”

第九种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观风色、察动向，随时转变立场、改换门庭的变色龙型。此类人物虽然少之又少，但却是运动场上最活跃的一小撮人。他们在造反派失势挨整的时

候，追随当权派，上窜下跳，打击迫害被整者。在批斗会上，声嘶力竭，口沫四溅，上纲上线，调子唯恐不高，帽子唯恐不大，必欲置造反派于死地而后快，以此向当权派献上自己的忠诚，目的是从当权派那里得到好处。待到造反派翻身，他们又以最快的速度转过来，向造反派输诚，说自己也是受当权派迫害，一直暗中站在造反派一边。在批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会议上，同样是声嘶力竭，口沫四溅，上纲上线，甚至动手打被批斗者一个耳光。造反派虽然了解他们的品性，但也对他的积极性予以认可，给他工作机会，发挥他的作用。然而，好景不长，时势翻转，造反派再次失势。他们又最快转变，大杀回马枪，反戈一击，与造反派划清了界线。然而，他想再次取得当权派的青睐已经相当困难，不过，他不气馁，有耐心，不断贡献造反派的罪行材料，得到当权派的再次利用。待到清查“五一六”，他们也不能幸免。为了尽快脱出困境，他们会最早坦白交待，不仅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而且揭发大量“五一六”罪行，编造出天方夜谈式的“五一六”神话，成为落实政策的典型，最早获得解放，使自己的处境得到改善。这种人毫无节操，唯利是视，其行动犹如伊索寓言中的蝙蝠，在鸟兽中不断转换类别。他们身上展示的人性之恶、之劣、之卑、之鄙、之可怜和可笑，都具有恩格斯所说的“这一个”的典型性。

“文革”是人性展示的大舞台，几乎每一个人都无法逃避展示。所谓“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庶或近之。

□ 摘自孟祥才：《学部“文革”亲历记》，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9年12月

~~~~~  
【荒唐年代】

“新时代的狂人”陈里宁

· 林 焱 ·

## 一、陈里宁和新《狂人日记》

1966年底，经过半年多的“革命造反”热狂，中国人民终于渐渐明白了一个令他们无比惊异的事实——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标是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几乎与此同时，一个英雄的名字也传遍了全国——陈里宁。记述这位英雄事迹的文字材料《狂人日记》风行一时，成为当时最“畅销”的读物。

万字左右的新《狂人日记》表现了一个超人式英雄——陈里宁，他早就洞察到刘少奇是革命的敌人，并无畏地向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起攻击。他因而被关进监狱、关进疯人院，受到“残酷迫害”，但他仍然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

新《狂人日记》的形成过程与围绕着它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典型地表现出文化大革命中的主导性文化现象和精神景观——全民性政治狂妄症和文革政治斗争的重要规律。

陈里宁生于1933年，只有初中文化程度，60年代初担任湖南湘潭市政府资料员，曾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据《狂人日记》中的材料证明，陈里宁从1957年起就“害怕”刘少奇反毛泽东。此时，他还只是个二十多岁青年。在全国人民对中央领袖与领导人无比热爱的时代，在没有甚

么依据的情况下就“害怕”这个领袖反对那个领袖，这只能被视为精神狂想症状。1963年4月，陈里宁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原因是他“以毛泽东思想打击敌人”，而“敌人”是他所在机关的领导人。1963年—1964年间，陈里宁三进三出精神病院。1964年10月2日，陈里宁第三次出院后，给《湖南日报》投寄了两封信。这两封信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里宁还给毛泽东主席与林彪元帅投寄了信件。陈里宁给毛、林发出信件不久，就被拘捕了。这一回不是送进精神病院，而是送进监狱。

陈里宁在狱中的言行被慎重地记入档案。监守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

1965年2月11日

犯人自言自语说：“毛主席，救救我！”下午，犯人提出受审之后，搜出犯人用指甲在上面刻着字的肥皂，上刻着毛主席万岁！妈，永别了！共产党万岁！

1965年2月22日

犯用草根在手纸上刺小洞，让小洞排成字句：毛主席，永别了！我无罪，祝您万岁！

1965年3月25日

犯人在被提审回到住室后自言自语说：我要去看天安门！我要跟着共产党走，走毛主席的路。你们把我关在这里，我跑也跑不了，你们把我放了吧，我死也死个光荣呀！我要看看毛主席，看看天安门。

1965年5月19日

犯人说：难道我相信马克思、列宁的话我就反动吗？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教，我不信天主教和蒋介石的鸡巴教，我就反动吗？我思想搞不通。

1965年6月22日

犯用手纸叠了一只鸽子，并和它说话：“我骂了皇帝，骂皇帝是要杀头的呀。反革命份子真厉害，想当皇帝。”

狱中的档案，后来也成了《狂人日记》的一个重要部分。

攻击国家主席，这已经构成特别重大的犯罪事实，引起全国最高司法机关的重视。陈里宁没有马上被审判，因为当局还怀疑他的行为是否属于精神病。陈里宁被送进北京安定医院。医生们对陈里宁的鉴定意见也不一致，这给了陈里宁最可宝贵的一段时间。陈里宁还是不断地写日记。公安部门和医院配合，诱导陈里宁作充分表现。陈里宁的病态更加严重，他感觉到“革命”的紧迫性和自己处境的艰难。他写下了很多文字，而且令人惊异的是他非常熟悉革命导师的理论与言论；对他所怀疑的对象刘少奇也十分了解。陈里宁一丝不苟地把批判刘少奇的观点一条一条写下来。这个精神病患者在病发期间的撰述，相当于文化大革命中全国革命人民批判刘少奇的一份提纲，全面涉及刘少奇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反动”观点，找到了后来中央高层斗争中刘少奇被打成“走资派”的大部分证据。

如果没有那场革命运动，陈里宁面临的命运一定是被判为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份子。然而，一个史无前例的机会使他成了时代的“英雄”，成为闪耀在政治天空上的大明星。

## 二、上书中央文革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陈里宁给“中央文革”写了多封信，其中的一封写于1966年国庆节：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现在全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我这个失去自由的人，情不自禁地高兴得跳起来。我虽然没有参加运动，但我对文化大革命有关消息感到十分亲切！内心里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在北京时间内，有关当局（不明身分）曾经对我审讯了七个月，我尽可能把一切想法和问题，向政府有关当局作了彻底交代。他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说我是反革命，阶级异己份子等等，扣了一些帽子，使我感到惊奇。

（信中批判刘少奇的内容略——引者注）

我对以上问题一直找不到答案。如果我错了，又错在甚么地方？我承认我水平很低，没有经验，我怀疑了一个庞然大物——刘少奇。但是矛盾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既有明显的矛盾，我有权利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名义理解这些矛盾。头可断，血可流，都在所不惜。问题不弄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死不瞑目！

最后，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礼，内心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在此之前，陈里宁多次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这些信的内容跟他以前的信件相比，明显地通顺、有条理和富有理智了。刘少奇在政治舞台上日益失势，这使陈里宁的“揭发批判”越来越显得有先见之明。

这应该成为精神病学研究的一个难得的个案。当政治动乱遍及全国、所有的正常人都陷入热狂时，这个精神病人的情绪却稳定了下来，并趋于痊愈。后来，陈里宁被“释放”出医院，像英雄似地在各种大小场合露面，他的讲话报告从容自如，条分理析，半点儿没有精神病症状。文化大革命使全国人民精神失常，却使精神病人恢复正常！

1966年8月，在“破四旧”的狂潮中，北京安定医院被改名“红卫医院”。1966年12月19日，清华大学的“红色教师造反联合总部”（简称“红教联”）的两个“头头”陶某和朱某到红卫医院“串连”。红卫医院“红旗战斗队”的主角金医生，听说来了烈焰赫赫的清华大学造反派，马上掷出自己的革命筹码。她说，医院里的精神病人中有的的是被“走资派”迫害的英雄——这就像众所俱知的苏联精神病院里关着很多真正的革命者一样。当天晚上，陶朱二人打电话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林杰。林杰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中央文革的王力、戚本禹等人看了林杰转送的材料，甚感兴趣，就委派《光明日报》的两名记者靳某与刘某参加工作。靳某、刘某到公安部调出有关陈里宁的40次审讯的档案材料后汇报中央文革，并对红卫医院造反派的人说：“你们建立了功勋！陈伯达、江青同志都知道了。”联络站的造反派士气大振。他们开始到处张贴大字报与标语，要为敢于揭发刘少奇的英雄陈里宁“平反”。后来，又组织一批人直接到公安部去“造反”。

1967年1月7日，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王力、戚本禹亲临红卫医院，接见了医院红旗战斗队、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教联、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医院“8·18”等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代表，询问陈里宁的情况，并审阅材料。他们没有马上表态，而是将材料带回去。当天下午四点，王力、戚本禹又来到红卫医院，在洗衣房里接见了“受迫害”的英雄陈里宁、王富显、王景端、高嘉夫等四人。王力对在场的人说：“我们支持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必须彻底造精神病院的反！全国有类似的精神病院，都要造反！”



### 三、活跃于文革舞台的“超人”

《光明日报》记者靳某把陈里宁从监护中“解放”出来。陈里宁穿着中央文革小组首长送的绿色军大衣，戴着红袖章，走上了文化大革命的舞台。

1967年1月17日，《首都红卫兵》报用整整四个版面发表了陈里宁的英雄事迹，题为《狂人日记》。这份相当权威的报纸，在向全国披露《狂人日记》前，可以肯定已经征得了中央文革首长的批准。红卫兵小报上说，江青把这份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说“很好”。新时代的“狂人”陈里宁几乎一夜之间“誉满全国”。公安部迫于革命群众的要求，给陈里宁开了“平反释放证”；后来更碍于情势而不得不开了“无罪释放证”。

陈里宁被邀到处作报告。这个湘潭市的青年干部，出现在首都的各个重要讲台上。每到一处，都博得红卫兵和造反派最热烈的掌声。

《狂人日记》的出现，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富浪漫色彩的人物形象。全国各地的专业艺术团体正愁着没有合适的节目，遂而纷纷上演各种版本的《狂人日记》。北京人民艺术剧团（人艺）编演了话剧《新时代的狂人》，中央戏剧学院师生组成的“长征”战斗队、“红旗”战斗队也编演了同题材的多幕话剧《敢把皇帝拉下马》。

郑州、杭州、重庆等城市也都上演了《狂人日记》，一些县级的文工团也不甘落后。同一题材的戏剧在全国各地上演，没有统一的剧本，各个演出团体现编现演。全国一齐上演的《新时代的狂人》，大体是活报剧——人物是一种政治力量或一种观念的代表，激烈地宣诵着政治性的宣言。

《新时代的狂人》与其他同题材戏剧盛行于1967年3月到1967年8月。当时除了八个样板戏之外，戏剧舞台上能上演的节目大概就只有这部高喊“打倒刘少奇”的作品了。

1967年8月初，造反派们从秘密的渠道知道毛泽东离开北京，于是发动包围中南海，组成“揪刘火线”，要“揪出”刘少奇。这实际上是由中央文革指挥的粗暴的政治冒险行动。在“揪刘火线”的现场，多次演出了鼓舞士气的戏剧《新时代的狂人》。这个戏成为政治斗争的炮弹。

### 四、病态显露，再坐囚车

陈里宁以英雄身分活跃于政治舞台上，每天都要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仰慕者会面、交谈。疯狂的政治斗争使他的精神状态一时亢奋得似乎“正常”起来。但毕竟他是个精神病人，在发表谈话时，难免会露出病态。1967年4月，陈里宁被化名为李明，以《光明日报》记者身分到农村去搞“调查”。此举事实上是让他离开狂热的斗争中心，以平静情绪。

1967年7月，戚本禹、王力的联络员王广宇和傅崇兰又把陈里宁安排到香山疗养院疗养，这时陈里宁的使用价值也差不多完了。

1967年7月，王力在武汉“七二〇”事件中当了大英雄，江青搀着他接受数以万计到机场迎接的群众的欢呼。但到8月底，以周恩来署名的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批准。红卫医院联络站的造反派得知王力、林杰垮台的消息后，顿感不安。曾经慑于中央文革威力不敢声辩的公安部人员，此时也“造反”，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贴出大字报揭露陈里宁的罪恶滔天的反革命行径。清华大学“红教联”、红卫医院造反联络站的诸头头针锋相对地贴出大字报，反驳对陈里宁的批判与揭露。双方展开拉锯战，谁也不甘服输。

10月21日，以公安部长谢富治和文革小组戚本禹的名义通知对陈里宁持相反意见的两派代表一共28人到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开会。公安部长谢富治对陈里宁作了权威的判断：陈里宁反对刘少奇，不能成为罪名；但他也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许多批判与攻击。谢富治又讲到，陈里宁“反动”分量少，多半是“混乱”。这个精神病人，两派组织没必要为他再争论了。精神病先治，其他问题再审查。就在这一天，陈里宁被公安部逮捕。

陈里宁糊里糊涂地坐上警车后才有点觉悟。他拼命挣扎，高喊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他认为又是刘少奇背着毛主席对他进行“迫害”，他准备以更顽强的姿态进行战斗，写下《狂人日记》新的篇章。

## 五、并不偶然

文化大革命初期，政治狂妄症弥漫整个社会。红卫兵和造反派往往只凭着极其表面、极其肤浅的理由，就对政界重要人物发动进攻。

以下我们来看两个遭遇“相反”但却非常相似的人物：一个是“炮打”陶铸的英雄，一个是“炮打”林彪的英雄。前者叫做陆荣根，1949年出生，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是上海时代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1966年11月20日、12月1日，陆荣根作为红卫兵到北京串连时，两次在中央宣传部贴出长达万言的题为〈炮轰陶铸〉的大字报。

此刻，陶铸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是中央的第四号人物。陆荣根当然受到众多红卫兵的围攻，甚至毒打。这两次张贴大字报，正值当时称为“十一月黑风”的日子——各个派别的红卫兵由于不同的原因，几乎向所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发起责问和挑战，许多红卫兵因此成为反革命份子被捕入狱。陆荣根的遭遇稍好一些，他被“革命”的红卫兵“监护”返回上海。这种所谓的“监护”，当然包括可以想像到的折磨和虐待。因此，一个多月后的2月12日，陆荣根因“身心遭受严重的损害”而死。

此时，陶铸亦一举变成“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三号人物。1967年的9月，《人民日报》公开批判陶铸。9月10日，《人民日报》以两大版的篇幅发表了经过整理的陆荣根大字报，题目还是〈炮轰陶铸〉！编者的按语盛赞：

在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威武雄壮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不仅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敢造反，而且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善于斗争，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进一步掌握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把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与严格的科学态度很好地结合起来。以摧毁性火力，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猛烈的进攻。

陆荣根一夜之间成了名扬全国的革命英雄、小烈士（很短暂地被视为政治超人）。陆荣根炮轰陶铸的根据是甚么？他发现了陶铸的甚么罪证？在两篇分别一万多言的〈炮轰陶铸〉中，他列举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陶铸在〈光辉的太阳〉这篇短而又短的文章中写道：太阳很灿烂，但“太阳本身还有黑点”。如此而已。

仅仅根据这句话，一个中学生就敢于宣布国家的第四号人物就是这个国家的敌人！他与陈里宁的精神状态有甚么区别吗？

第二个例子也发生在“十一月黑风”中，即“伊林·涤西”事件，它的影响更大。

1966年11月15日，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高中三年级二班的刘振忠、张立才两位同学，以“伊林·涤西”的署名在清华大学张贴〈给林彪同志一封公开信〉。当天，这份公开信被其他红卫兵撕毁。三天后，他们把这份公开信印成传单到处散发。12月中旬，这两名中学生被捕入狱。北京大学东语系乔兼武写了赞成“伊林·涤西”公开信的传单，不久也被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伊林·涤西”的公开信被盛誉为反对林彪的“第一声惊雷”，称赞这两位中学生“尖锐地批驳了林彪神化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并指出林彪的作为将使中国共产党面临法西斯党的危险”。

将“伊林·涤西公开信”的内容和陆荣根大字报比较，我们却非常容易看出其相似之处。“伊林·涤西”批判林彪的依据是甚么？是林彪1966年9月18日在军事院校的一次讲话。

他们批判的第一个要点是，林彪说毛泽东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伊林·涤西”反驳的论据是——斯大林说过列宁并不比马克思、恩格斯高出一等。批判的第二个要点是，林彪说马克思、列宁的书太多，离我们太远，所以我们要用99%的时间读毛泽东的书。反驳的论据是——毛泽东说过要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著作。

如果依据“伊林·涤西”所列举的这两条理由，就能判断出“林彪的作为将使中国共产党面临法西斯党危险”，就认为要批判并打倒林彪，那简直是把整个国家复杂的政治运作视为儿戏。红卫兵“小将”不过走红了一年多，就被打发去“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了。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明白让他们扮演“政治超人”的戏已经落幕。然而，全民性的政治狂妄症并没有最后终结。对全民政治狂妄症的报复，则是延续相当长久的全民的精神灾难与信仰危机。

□ 来源：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  
~~~~~

【研究报告】

内蒙东部“温和土改”与乌兰夫的文革倒台（下）

• 程惕洁 •

（上接 z k 2 0 0 1 c）

1949年中共建政后，原由国军控制的绥远省，以和平方式转手，华北和西北许多蒙汉聚居的区域，转交自治区管辖。1951至1952年，包括乌兰夫故乡土默特旗在内的大片农区，开始土改。这里靠近黄河、水利方便、土质肥沃，在农耕集中的土默川平原与河套平原，汉族人口比重较大。原来内蒙东部制定的土改政策，到这里又进一步演变，主要表现为对蒙族农民的照顾。这包括“分走”和“分进”两个方面。比方“分走”，蒙族地主要比汉族地主降一个档次：“凡剥削收入相当于汉族一般中地主的，划为小地主；相当于汉族大地主的，划为中地主；超过汉族大地主的，划为大地主。”在“分进”成果时，无地少地

的蒙族农民（贫下中农），要比汉族贫下中农“多分一份至两份”的土地和生产资料（15）。

换句话说，在“分走”的时候，蒙族降一个等级；在“分进”时，蒙族则高一到两个档次，分到的利益，可以是汉族农民的两至三倍。有点类似于美国少数族裔的平权计划，出发点是减少不平等，实际结果可能导致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我当记者的1968年，内蒙开始全面清算乌兰夫的“三反罪行”，在采访河套汉族农民时，我曾私下问他们，怎么看乌兰夫土改中照顾蒙族的政策？没想到，他们异口同声：“咱们得将心比心说实话，这里本是人家蒙古人的地方，人家多分多占点是应该的。咱们口里外来户，逃荒要饭到此地，人家不撵，让咱们活下来，就不赖了，何必还争什么你多我少？”

“按民族区别对待”，究竟合不合理？可能人言人殊。类似于“美国原住民和外来移民”应不应该平等？如何平等？非常复杂，没有简单答案，容易挑起种族情绪，所以还是绕开它，顺着主题往下说。总之，乌兰夫和自治区的“温和土改”，最终不但获中央认可，也受到各族百姓拥护，产量明显提高，牲畜头数增加，等等，都可预期。回顾中共建政以来，每次社会创伤，都是鬼抽筋的结果，只要少分少斗不折腾，社会自然和谐，安居乐业不难，这容易理解。

比较奇怪的是，毛共高层，对乌兰夫“另搞一套”，居然投了赞成票，前后有过三次“明确无误”的表态支持。第一次是上文提到的1948年7月，在哈尔滨召开“内蒙古干部会议”，全面总结内蒙东部土改的经验教训，特别强调内蒙与其它汉族地区的区别。虽然整个东北土改，也有过“宁左勿右”和“纠偏调整”，但范围和程度，与内蒙的“特立独行”，不在同一个层次。这是毛共高层少有的“开恩”，给“温和土改”开绿灯。会议由东北局主持，把内蒙各级干部，请到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中央安抚地方、汉族安抚蒙族的意图，十分明显。

第二次是1950年5月，在总结内蒙东部土改经验的时候，乌兰夫在报告上提出“慎重缓进”策略，被周恩来修改为“慎重稳进”（16）。宰相一字之改，“缓”变成“稳”，似乎表明“稳中求进”，其实乌兰夫的“缓进”语义类似，在实际执行上，更无区别。但可说明，周恩来和毛共中央，对内蒙古特立独行的土改政策，在效果上是满意的，所以才表态支持。

第三次是1956年，在中央召开的“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会上，乌兰夫和新疆书记王恩茂发生分歧。讨论牧区的阶级路线，究竟“依靠什么人”的时候，王恩茂提出依靠“贫苦牧民”，乌兰夫则主张依靠“劳动牧民”（包括牧主在内，因为他们也参加劳动），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毛泽东征求乌兰夫、刘少奇等人意见后，明确表示，“关于牧区社会主义改造，以内蒙古的提法为宜。”于是，到同年7月25日，“中央批转《关于新疆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对新疆提出的‘依靠贫苦牧民’这个口号，认为是不妥当的。‘少数民族的畜牧业，跟农业区的情况很不相同，……提出这个口号，容易使牧主和牲畜较多的牧民误解为‘贫苦好’，因而就可能发生屠宰牲畜的现象。既然我们在牧区不准备公开划分阶级成份，就不必提出这个口号。内蒙古提出的‘依靠劳动牧民’中央认为这个口号是适当的，你们可以采用。”从此之后，包括新疆、甘肃、青海、西藏、四川等省区在内的草原牧区，都遵照中央指示，采用了乌兰夫的提法和政策（17）。

四，“行仁政”惠及全国，“黑社教”风向突变

从1957到1959这三年，尽管经历整风反右、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等一系列疯狂，但对内蒙古来说，仍然经济发展较快，日子相对好过。此后三年是大饥荒，再往后是四清、文革，最终折腾到“崩溃边缘”。

1959年我升初三，从河北农村转学到呼和浩特，赶上农村户口准许迁入城市的一班车。我对内蒙的印象是，“三面红旗”紧跟中央，“大炼钢铁”和“工业上马”，比河北省不差，甚至更左，包钢、二冶，一机、二机等大型项目，都是那时候搞起来的。城市工业膨胀过快，一度无节制吸收外来人口，出现粮油紧张。但在农村牧区，乌兰夫继续推行宽松政策，有利于缓解食品短缺，对嗷嗷待哺的千百万饥民，雪中送炭。有三个事例可以说明，为什么乌兰夫在土改中奠定的仁政，到三年大饥荒当中，更加显示出优越性，因此，至今被百姓怀念不忘。

第一件，死亡边缘，救人无数：内蒙原本地广人稀，加上土改政策宽松，闲散土地容易找，只要肯下辛苦，填饱肚子不难。所以当大跃进失败，工业下马的时候，内蒙并没有逼迫那些内地农村来的劳动力（俗称盲流）返回原籍，而是允许他们在内蒙自谋职业，或者下乡务农，因此，等于挽救了许多来自内地的农民及其家人，如果返回原籍，其中许多人难逃冻饿而死。最令人感动的一幕，当数内蒙牧民，带头收养“上海孤儿”的事，我在草原采访时，曾见过几个。以下是维基百科的介绍：

所谓上海孤儿，是指大饥荒时期，被抛掷在常州、无锡、苏州和上海各大城市，之后被转移至华北地区收养的大量弃婴。……

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为此问题找到乌兰夫，希望他能从牧区调拨一些奶粉。乌兰夫在请示了总理周恩来之后，做出更大决定：发动整个内蒙古，将一批孤儿接到牧区，交给牧民抚养。此后，仅仅在1960年，内蒙古就安置了2000多名南方来的孤儿。号称三千“上海孤儿”，就这样在内蒙草原找到了新家。

之后，陕西、河北、河南、山东等省，也陆续接受了江南弃婴。这次大转移，直到1963年粮食形势好转之后，才逐渐停息。据有限材料推断，总人数当在万人以上（18）。

除了有组织接收上海孤儿，还有大批自发流动人口（统称“盲流”），继续从内地乡村进入内蒙。其实他们根本不“盲目”，大都经过亲友指引，到内蒙逃难谋生，属于经济难民。尽管在接收还是拒绝的问题上，内蒙历来有同情、容忍和反对等不同观点，但总体说，“走西口”的历史传统，从来没有停止过。据一份新华社内参透露，截至1960年4月，内蒙共接受内地流民28万（19），其后数量应该更多，没查到准确资料。

例如巴彦淖尔盟乌拉特中旗，与我生活过的乌拉特前旗交界，面积2·3万平方公里，半农半牧，现有人口14万（当时人口不足十万），据《乌拉特中旗志》中记载：“1957年至1961年，由外省各地流入旗内的人员达2万余名，以山东、山西、河北、陕西、河南等省居多。对上述流入人员，通过说服动员，共遣返2，000余名（十分之一），并使他们的生产、生活得到了妥善安置”（20）。这样一个小旗县，可安置近两万外来移民，那么，全自治区百余个旗县级行政区，其中许多农牧业条件都比乌特特中旗更好，因此，估计总共接收上百万，应该可能。据我采访过的移民说，他们到村里后，先借住在村民的小土房（凉房）里，从生产队借几十斤救命粮，在队里指定的闲散地上随便种点什么，也到队里挣点工分，到秋季归还借粮，慢慢也就成了没有户口的“编外“社员。几年以后，上级有政策时，允许他们把农村户口从原籍迁来，甚至还把年迈父母一同接来，慢慢落地生

根，成了内蒙农民。可见，比较而言，内蒙农村牧区，还是容易生存的地方。这跟乌兰夫在土改中实行温和政策，给农牧民留有比较宽松的生存空间，应该有因果关系。

第二件，内蒙虽然也饿，但明显好于内地：我本人1959年迁到呼和浩特，但每年暑假都会返回河北农村，探望母亲弟弟，参加集体劳动，帮他们挣点工分。为观察不同地区，我经常从呼和乘火车到北京，在亲戚家住几天，然后，改乘公交车，途经保定或天津及沧州，返回饶阳。许多人想当然认为，北京天津等直辖市的食物供应，一定比其它省市好。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我通过多次对比，觉得京津两地供应情况，略好于河北的保定和沧州，但明显没有呼和浩特好。唯一区别是呼和浩特细粮比例少，杂粮比例高。但那个年头，只要能混饱肚子，品种花样退求其次。比方说，呼和浩特供应莜麦面，属于杂粮，但比较好吃，且热量高，经饿。这是内蒙常见作物，抗寒耐旱，但产量较低。农民说它“地里产量低，肚里产量高”，所以很受欢迎。

另外，北京天津的蔬菜市场，凭副食本供应，精确到每人几斤几两，像南瓜、萝卜、茄子等大片蔬菜，有时需要切开卖。呼和浩特没这种情况，都是论斤，取整数，多几两少几两，就四舍五入了。

除了市场供应，内蒙还有两种代食品，值得一提。一种比较难吃的是甜菜渣（也叫糖菜渣），是甜菜榨糖后的下脚料，通常掺在动物饲料中。困难时期，人们也偶尔加在粮食中，当饭吃。虽营养不多，有股怪味，但比吃草根树皮观音土，还好许多。1961年寒假，我回河北，在沧州火车站，看见装卸工人，正从内蒙来的车皮上卸甜菜渣。据呼和浩特糖厂干部说，困难时期，他们的糖菜渣，曾免费运往内地许多省份，河南、山东、安徽最多。

另一种代食品比较稀罕，叫蒙古黄羊。是边境草原常见的野生动物，样子有点像豹子孢子，繁殖快，成群结伙。当时没有保护野生动物观念，所以鼓励人们去打。一般夜晚围堵。车灯一开，黄羊群不辨方向，容易猎获。打黄羊是边防部队开的头，经验传到地方，凡有枪弹和机动车的机关、民兵、体育部门等，都纷纷去草原打黄羊。我父亲所在的呼和运输公司，也打过几次，我家分到一只，味道介于山羊肉跟孢子肉之间。

1960年冬天，应北京军区要求，内蒙往北京运送了几车皮冷冻黄羊，北京军区还送给中央首长“尝鲜”。此后，北京不少单位，纷纷到内蒙猎杀黄羊，一时成风。因为不进市场，只在单位内部分配，所以，经常有机会吃到黄羊肉的人并不多。有消息说，上世纪70年代，内蒙草原尚有野生黄羊300多万头。到世纪末，仅剩百余万头。最近20年，由于过度开发，生态恶化，加上非法盗猎，尽管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有人估计整个内蒙古，也只剩数千头了（21）。

从直辖市没有特惠这一点看，当时的毛周高层，尚存一点点“共甘苦”理念。至于高干“特供”、“内部商店”和“侨汇商店”等等，据我所知，大都发生在大饥荒以后，此处不赘。

第三件，应中央要求，紧急调运救命粮：如果说上述两件事（接收孤儿和支援副食品），不过是小打小闹，聊胜于无的话，那么，再看看内蒙向内地支援救命粮的事。要知道，内蒙虽然面积辽阔，但劳力少，气候差，技术落后，并非产粮大区，加上工业发展迅猛，城市膨胀过快，粮食基本不能自给，要靠内地省份支援。然而，拜托“温和土改”和比较宽松的“三自一包”等惠民政策，大饥荒的肆虐程度，没有某些内地省区那么严重，于是，乌兰夫在最困难的1959到1960年，应中央要求，居然能动员民众，向京、津、沪直辖市和传统产粮大省辽宁，紧急调拨救命粮11亿斤。当时内蒙人口1300万，相当

于每个居民贡献85斤，以平均定量28斤算，大约是三个月口粮。这个看似不可能的怪事，居然发生了。

信息来自毛纯礼于1960年4月26日写的一篇新华社内参，题目是“内蒙古积极调运粮食支援京津沪等地”，摘引如下：

1959—1960粮食年度，全区上调任务为11亿斤（贸易粮），到3月底已经上调粮食6亿6千万斤，占计划的60%，下余的4亿多斤必须在5月10日前完成。

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集运问题。……采取上述措施后，仍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各地增添的车辆还没有达到任务数量。其次，请求中央调入的汽车尚未落实。……第三，汽车零件不足，出车率很低，由于缺乏零件，基本上不能工作。

（二）铁道部门的配车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呼和浩特铁路局，已经出现不能按期完成配车计划的现象。

（三）内蒙古大批外调粮食以后，在工矿城市供应方面可能出现品种单调现象。同时，当前全区有外省流入人口28万左右，加上扩大耕地面积和基本建设规模的增加，粮食的需要不断增加，因此完成上调任务后，库存是很紧的。内蒙古希望中央在安排第三季度计划时，为自治区调进一部分粮食（22）。

编印材料的这个“批乌联络站”我很熟悉。在滕海清支持下，最早拼凑乌兰夫罪证，往“挖新内人党”方向引的这帮人，包括蒙族作家乌兰巴干，和我熟悉的两位报社同事。奇怪的是，这明明是给乌兰夫表功，怎么倒成了他的“罪状”？至于说乌强调某些困难，那也不是胡编，只不过讲了实话。岂不进一步说明，内蒙面对困难，自己勒紧裤腰带，也要对中央和内地无私奉献吗？我就此事询问过许多内蒙朋友，他们也没听说过此事。这份内参，很可能被滕办以泄密为由，扣住没发，也说不定。

就在乌兰夫无私支援内地粮食之后，不过两三年，随着经济状况好转，政治气候开始改变，中苏、中蒙关系公开破裂，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开始“四清”和“社教”（全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下乡的叫“四清”，留城的叫“社教”，也叫“城市四清”，都是阶级斗争。“四清”未完，接着文革。现在回忆，匪夷所思。这里只捡跟东北土改相关部分，略做介绍。

文革初期，批判刘邓，有种观点，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整“党内走资派”，而“四清”和“社教”是逆流，把斗争矛头指向普通干部群众，比如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因此称为“黑社教”。

要是站在中间立场，客观评价乌兰夫政绩，应该说功过相当，或者过大于功。温和土改是主要功绩，其它左倾害民的坏事，也没少干。起码在文革前，几乎所有毛共在内蒙造的罪孽，都有乌兰夫一份。在对待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上，乌兰夫比北京更左。比如，同样跟随傅作义、董其武起义的国军将领，在北京算“革命军人”，在内蒙算“反动军官”，屡遭迫害。乌兰夫的同乡，抗日名将高理亭将军，原国军骑兵旅长，起义后任解放军36军副军长。在镇反运动中，以莫须有罪名遭枪决（23）。另外，以反“地方民族主义”为名，在整肃东部蒙古人方面，他也毫不手软，只有少数上层统战对象例外。

记得从大二到大三（1964到1965）这两年，包括内蒙师大在内的各高校，都参加了这场运动。除我们外语系之外，师大各系轮流下乡四清，讲蒙语的到牧区，讲汉语的到农区，半年到一年。留校者则半天上课，半天社教。其中一个学期，内蒙师大集中搞“民族政策学习”，专门批判已被停职的党委书记特木尔巴根，和他包庇的蒙族师生。弯腰、低

头、检查、声讨，除了没戴高帽游街，其它阵势，跟57年打右派完全一样。当时，乌兰夫尚在台上，表面地位稳固，还对“四清”、“社教”频发指示，声称“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从印发的材料看，我们隐约感到事态严重，因为文件精神互相矛盾，好像中央和华北局，已经插手内蒙具体工作，华北局派庞大的工作组（清一色汉族老革命），到内蒙参加“四清”，不少人都留在内蒙当了领导，有明显的“掺沙子”味道。

另外，还有东西部蒙族的关系问题。我校批判的特木尔巴根，跟内蒙高院院长同名，也是东部蒙族，参加过自治政府和东部土改的领导工作。在批特过程中，内蒙党委派来以潮洛蒙为首的工作组坐镇。潮是土旗蒙族，延安民族学院出身，属于乌兰夫亲信。而跟随特木尔巴根一起被批判的两个学生，也是东部蒙族。其中之一满都格其，特意安排在批判大会亮相，被公安厅当场逮捕，做秀味十足。同学们私下议论，这是一场东西部蒙族的内斗。乌兰夫试图通过公开整肃几个有“民族分裂”倾向的东部蒙族，来证明他所代表的西部“延安派”是正确的，而东部的“内人党”或“东蒙自治派”，则跟中央对着干，因而是错误的。

其实，乌兰夫试图强调的东西“路线分歧”，在北京看来，是非常表面，甚至毫无意义的，因此才说他是“舍车马保将帅”。因为在北京眼里，从东部土改开始，在一系列经济社会与文化路线上，乌兰夫都试图“标新立异”“另搞一套”，说好听点，是“维护自治”，难听点，就是“跟毛主席革命路线唱反调”。中央一再姑息容忍，现在已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程度。因此，从“四清”“社教”开始的新一轮折腾，应该是乌兰夫和自治区命运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五、毛、周、邓秋后算账，乌兰夫如梦初醒

本节转谈中央如何对乌兰夫秋后算账，彻底整肃。中央对乌的态度，其实经历了一个从基本信任，到部分怀疑，再到基本否定，最后彻底打倒的转变过程。另外，毛周对乌的态度，有所区别。但如果毛要打倒一大批革命元老，周别无选择。就连“刘邓陶谭，彭罗陆杨”都如此，何况一个地方官员乌兰夫？所以，在整肃乌的过程中，周刘邓三人，都是毛的帮凶。

中央态度的转变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五个不同程度（或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跟华北局的路线分歧，由暗转明。

1963年10月，乌兰夫公开表示对中央的阶级路线不满，说“没有划阶级完成了民主改革的任务，公社化以后，社会主义时期，为什么非划阶级不可？牧民脑子里是没有阶级的，硬给人家划阶级是主观主义”。1964年夏天，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到内蒙视察，指名批评乌兰夫，说“内蒙一潭死水”“在民族问题上右倾”等等。此时，“三不两利”政策，已经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对立面。在中央压力下，乌兰夫只好让步，到1965年，自治区才发了一个〈牧区划阶级的规定〉（24）。据牧区四清的蒙族同学说，那个〈规定〉其实也是走过场，并没有认真执行。

第二阶段：为争取民族“自治”，跟中央顶牛，导致关系恶化。

乌兰夫虽然已经汉化，不会讲蒙语，但他所受的教育，包括蒙藏学校和留学俄国，还基本属于传统熏陶和原教旨训练，而非儒法之道，对权术不够精通，所以真心信仰毛共对民族自治、自决的虚假宣传。他也用这套理念收编东蒙领袖，以为他领导下的自治区，真可以高

度自治，实现振兴蒙古民族的梦想。因此说到底，他太天真，“太过认真”或“太过理想”，所以酿成大祸，栽了跟头。

既然连宪法都当儿戏，何况民族自治法？乌兰夫和自治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哪些需要报批，哪些不用？都是糊涂账。实践证明，事无大小都请示，比较稳妥。就算自治条文白纸黑字，说某某不用报批，但你要真自作主张，圣上哪天要整你，必是罪过。这是王朝政治的“优良传统”，至今依然。这里点评四件比较重大的“顶牛”事件。

第一，对藏区“平叛”的态度。早在1955年平定所谓“川藏叛乱”，乌兰夫就说过“对少数民族打仗是下策”（25），但人微言轻，没人听他。到1959年事态闹大，内蒙也不得不派骑兵参与，回来之后，有些“英雄”还巡回演讲，我感到头皮发麻，见识了什么叫“以夷制夷”。乌兰夫当时的矛盾心理，在毛周心目中，已经留下芥蒂，后来也成了他的罪过之一。

第二，对蒙文改革的立场。还记得自治政府成立时的主席台领袖像吗？外蒙的乔巴山跟内蒙的乌兰夫并排悬挂，这个镜头显示了内外蒙古一家亲。在苏联殖民下，外蒙把从上往下写的老蒙文，改成从左往右写的斯拉夫字母（新蒙文）。老乌觉得，新蒙文有利于统一各地蒙语方言，所以主张学习推广。但北京坚决反对，表面理由是汉语拼音采用拉丁字母，其它民族语言，也应该拉丁化（26）。真实理由，还是不希望他们文字统一，防止为内外蒙合并提供方便。最后结果如何？当然是乌兰夫宣布放弃。

第三，反对草场乱开垦。这个问题历史悠久，一向是汉蒙矛盾，农牧矛盾的聚焦点。乌兰夫其实知道，完全固守自然游牧，绝对禁止农地开垦，不但在内蒙行不通，也不利于经济文化发展，甚至不利于草原现代化建设。他所反对的，是不管条件好坏，不搞科学论证，无规划的“胡乱开垦”。于是1962年，经过调研考察，乌下令关闭19个国营农场中的7个，把已开垦但不宜耕的200多万亩土地，还草还林（27）。这件事触怒了王震和北京高层，成为乌兰夫搞“独立王国”的新罪证。

第四，扩大自治版图，与邻省争地。自治区成立后，有数次扩大版图行动，特别在中部和西部，许多汉人省份的蒙古人聚居区，陆续划归内蒙，例如察哈尔、绥远、热河、甘肃或宁夏的部分地区，也划入内蒙。具体执行中，难免有省区之间的争议。但当时可是执行毛的圣旨《三五宣言》，他曾放言“恢复内蒙古历史的本来面貌”，乌兰夫当然愿意。但到了要整肃他的时候，原本的圣旨也就没人提了。

第三阶段：反对“大汉族主义”，重印《三五宣言》，触犯大忌。上述种种摩擦，让乌兰夫痛感内蒙古难以“自治”，阻力来自“大汉族主义”肆虐，所以，他误判自己，1965年底，下令重印《三五宣言》，即有名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这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2月20日，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名义发表的。主要五条内容：1，归还原来属于蒙古人的所有土地；2，蒙古人有权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他民族结成联邦，也有权完全分立起来；3，内蒙古境内的其他民族，享有跟蒙古族同样的权利；4，把汉族占领的盐池交还给蒙族，在长城附近开辟贸易区；5，中共不进攻内蒙草原，愿与其他民族缔结同盟，共同对付日寇和国军阀，等等（28）。

当时我们也曾人手一份。读完之后，不敢公开议论，只好请党史课老师辅导。记得他说，基本精神是共产党信仰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尊重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和自决权。但不能机械理解，必须历史地看。现在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各民族已经平等，所以还

是要维护多民族的大家庭，云云。乌兰夫当年的大胆盲动，其实触犯了一个王朝大忌，那就是用过去的老圣旨，给今日朝廷脸上抹黑。这就像前几年，有人编辑《历史的先声》，让北京脸上无光一样。

第四阶段：改组党政机构，重用亲信，最终招致强烈反弹。如果说，前面三个阶段，乌兰夫与北京的摩擦，主要表现在具体事务上，还不足以让毛周下决心拿下乌兰夫，那么，到第四阶段，发展到政府重组和人事安排的关口，就一发不可收拾，逼得内蒙受到排挤的干部，非向中央告状不可，而中央也就断然决定收拾乌兰夫了。所以说，1966年初，乌兰夫改组政府架构的冒失举动，终于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1965年夏到1966春，乌兰夫做了四项改组内蒙党政机构的重大决定：

- 1，把秘书室与党委调研室合并，任命夫人云丽文为主任，颇有“举贤不避亲”意味；
- 2，更换党委秘书长，将原秘书长周明调离，由副秘书长张鲁代理，准备让土旗蒙古族浩帆接任；
- 3，虚化架空原常委，新设代常委13人，其中六人（包括儿子布赫）是土旗蒙古族；
- 4，撤销原厅局，成立五大委（农、计、财、工、文），原35个厅局的主要领导大幅变更。新任组织部长陈炳宇，准备对更多干部做进一步调整（29）。

如此伤筋动骨，逼迫受到威胁的干部们，别无选择，只好群起行动，向华北局和中央告状，揭发乌兰夫“排斥异己，包庇坏人，任人唯亲，个人专权”等问题，终于促使中央下决心，对乌兰夫采取行动。

第五阶段：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乌兰夫的滑铁卢。1966年4月25日，自治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主要领导82人出席。乌兰夫主导会议，大批“大汉族主义”，高锦明、权星垣、周明等人成为批判对象。乌兰夫和他的亲信意气风发，认为大权终于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中。岂不知，这竟是他们的最后盛宴。五天后，华北局派解学恭率工作组赴内蒙，传达李雪峰（代表中央）对乌兰夫的批评，说他“狭隘民族主义”。接着，工作组找告状人谈话，之后，于5月3日做出裁决：说“乌兰夫犯了严重错误，其性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一夜之间，乌兰夫就成了“三反分子”（30）。

乌兰夫当然委屈、疑惑、满腹牢骚，立刻赴北京，借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的机会，向中央陈情。此次北京之行，竟然是他“失去自由”的开始。这恐怕是包括乌兰夫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始料不及的。

政治局扩大会议（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主题，是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宣布文革开始。不等扩大会议结束，紧接着就召开“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从5月22日到7月25日），历时64天，解决华北五省区的领导班子问题，而内蒙的焦点，就是清算乌兰夫及其亲信。会议规模之大（146人出席），时间之长，变化之快，斗争之烈，令人乍舌（31）。

前文说过，前门饭店的斗争目标，并非乌兰夫一个，华北五省市自治区，都有务实派高官下台，但内蒙的斗争似乎更为激烈，除了路线之争，还夹杂着蒙汉民族的派系之争和权力之争，所以更为复杂。两个多月唇枪舌战，经历了五个惊心动魄的斗争阶段：

- 1，前两周学文件，包括〈五一六通知〉，〈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等等，统一思想，营造斗争气氛；

2，第三周是“揭盖子”。经过周密策划，让积极分子们，把准备好的“炮弹”甩出来。解学恭指出，自治区问题的要害，是不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走资派，反而宣传“民族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本质”，“反大汉族主义，不反修正主义”。反乌左派（王再天、权星垣、高锦明、雷代夫、郭以青、宝音巴图、高万宝扎布等）紧跟华北局定的调子，揭发乌兰夫和自治区更多问题。当然，也有保乌右派（李贵、陈炳宇等土旗蒙族）为乌兰夫评功摆好，保驾护航；

3，第四周是“挖根子”，由华北局领导李雪峰、解学恭、李树德亲自挂帅，对乌兰夫问题上纲上线，批评定调。李雪峰指出，“内蒙古党委的错误相当严重，闹民族分裂主义就是闹独立王国，就是反共。……我怀疑内蒙党委有一帮修正主义分子在那里操纵。”区党委书记处随即做出组织决定，“取消代常委，停止浩帆党委副书记的职务，隔离反省，收缴所有枪支”等等。随着压力增加，保乌派开始分化，有的降低调门，有的开脱自己，说本人也是乌兰夫的受害者。乌兰夫本人也开始软化，于6月14日忍气吞声做检查，给自己扣上两顶帽子，一是民族偏见；二是自卑感。这样的所谓检查，反而招致更大批判火力。

4，第五和第六周，进入“深揭狠批”阶段。21人大会发言，26人书面发言。批判会由内蒙党委扩大到全体成员，批判对象也从乌兰夫本人扩大到他的“死党”李贵，陈炳宇、石光华、墨志清、奇俊山、李文精、云瑞等。乌兰夫做第二次检查，把自己的错误升级，承认近半年来所犯的重大错误。

5，第七、八两周，是“穷追猛打”阶段。反乌左派对他的第二次检查进行面对面对面斗争，说他“假检查真进攻”，“对要害问题避而不谈”，开始触及他的历史问题，生活作风，以及私人交往，包括跟杨尚昆、习仲勋、张闻天、李维汉等人的关系问题。

6，最后两周是“收尾”，反乌派全面胜利，保乌派彻底失败。乌本人做最后检查，上纲上线更高，可谓“唾面自乾”。7月25日，会议结束。四天之后，华北局起草的《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呈送中央，确认乌五大错误：（1）反毛泽东思想，自立体系；（2）反对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3）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4）以《三五宣言》为纲领，搞民族分裂和独立王国；（5）安插亲信，篡党夺权。最后结论是“五项帽子”：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32）。从此，“当代王爷乌兰夫”的称号不胫而走。

回望53年前的斗争，不难发现，促使乌兰夫缴械投降的决定因素，除了毛周精心布置的前门饭店会议，还有会议期间，刘少奇、邓小平代表中央，对乌兰夫的当面约谈（训话），康生、刘春、奎壁在坐。

谈话围绕一个中心议题：民族主义。刘少奇说：“中央强调的不是你说的那个反对大汉族主义，而是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民族问题，不外是地方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两者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要反对，都要肃清。”

邓小平更为直截了当：“牧区阶级划分问题，内蒙落后于新疆、宁夏、青海、四川，还会落后于西藏。……你不如赛福鼎同志，他还站起来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你现在走的路是包尔汉的路，刘格平的路，扎喜的路，搞独立王国。再走，就走到达赖、班禅的路上去了。有这个危险。你拼命强调地方民族主义，哪里是前线，面对苏修、蒙修，不搞阶级斗争，你把内蒙引向什么方向？你不从这个地方深挖，是极其危险的。”（33）

对刘、邓代表中央对乌兰夫的定调，我有三点感触：

第一，尴尬滑稽的历史场景：中国的两个“最大走资派”，此时已陷入毛的天罗地网，他们主导的“资反路线”正在肆虐，试图重覆五七年“反右”，把贴大字报的学生打成反革命。没料到毛很快反击，让他们遭灭顶之灾。就在这当口，他俩却代表中央，郑重其事教训内蒙的“最大走资派”。他们不久的下场，甚至不如乌兰夫。因为民族身份护佑，乌兰夫没遭刘少奇的杀身之祸。这种滑稽安排，不知是历史巧合，还是毛周的巧妙盘算。

第二，违背事实的前后矛盾：曾几何时，毛周和中央，赞扬乌兰夫的“温和土改”和“三不两利”，适合少数民族草原牧区，还号召新疆、宁夏、青海学习内蒙。怎么一转眼，内蒙又落后了？不搞阶级斗争，不正是内蒙的长处吗？是好是坏，什么标准？不合逻辑，自相矛盾。

第三，因果颠倒的内外关系：把内蒙和乌兰夫的事，拉抬到与苏蒙对抗，对于恐吓乌兰夫和蒙古人当然管用，谁也害怕“通敌叛国”罪名，为身家性命计，只能低头。但问题是，当年为打日本，中共停止土改，改用“减租减息”和“三三制”，把土豪劣绅都团结起来。为什么苏蒙外敌当前，就不能缓和国内阶级矛盾，非要强化不可？当然，被告席上的乌兰夫及其同伙，除了接受“宗教裁判”，别无选择。至于心里服不服，就无从追踪了。

接下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乌兰夫及其亲密战友，从此失去权力和自由。乌兰夫一家，先被“监护”在北京，后被移送湖南。所谓“监护”就是“监督、保护”的意思吧，跟软禁类似。反乌左派书记们，返回内蒙之后，在对待造反派上，又分化改组，形成两大对立派系。一直闹到解放军开枪杀人，周恩来直接介入，派滕海清中将空降内蒙，组建革委会，事态才逐渐平息。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滕海清在中央授意下，随即施展“雄才大略”，要通过“挖肃”，把乌兰夫的社会基础连根拔掉。于是，朝“挖新内人党”方向发展，把蒙古人整得鸡飞狗跳，“家家闻哭声，处处设牢房”，最终造成人间惨剧，死亡率1—2%，伤残率4%，关押率17%，株连率50%〔34〕。

最后物极必反，毛周终于意识到酿成大祸，边平反昭雪，边调兵遣将，以“准备打仗”为由，全面军管并肢解内蒙，把五分之三的面积和五分之二的人口，分割出去，并入东北的黑吉辽和西北的甘宁，以防内蒙更大动乱。在这一新背景下，1972年，乌兰夫才被毛周逐步“解放”，回到北京，当选中央委员，恢复部分权力，出任统战部长等职。

乌兰夫回忆他的复出过程，说是周说服毛，念及他当年“单刀赴会”，去东部统战蒙古人，为中共打天下有功，云云，我认为他言过其实。论功劳，乌能比过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他们还不照样被整死？关键是稳定内蒙凝聚人心的作用，无人替代乌兰夫。“挖肃”和“内人党冤案”，把内蒙搞乱，难以收拾，只好请乌兰夫重出江湖，充当偶像，不让他拥有实权。这才是毛、周、邓的如意算盘。乌兰夫的名义地位，到邓时代继续上升，到委员长和国家副主席，但统战意味浓厚，防范之心不减，也不给他充分自由。仅有两次破例，特许他短暂回乡访问。

六、三条简短结论

从东部土改政策的不同思路与不同后果，到自治的假戏真演，再到乌兰夫的郁郁而终，我认为起码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

第一，“温和土改”与“暴力土改”孰优孰劣，不难判断。两种土改的各自后果，在大饥荒中突现出来，对比明显。一向缺粮的内蒙，居然能紧急动员，迅速援助京津沪和辽宁1

1 亿斤救命粮，很说明问题。内蒙古之所以有条件“另搞一套”，自有其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由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促成，其它汉族地区的土改官员，未必都缺乏人性与常识，不知道“暴风骤雨”对乡村经济的破坏与族群关系的撕裂，但他们没有乌兰夫的有利条件；

第二，从中共对乌兰夫“温和土改”先容忍后清算，也能反思共产党“民族自治”政策的真假虚实。汉族大一统观念，不但始终占据“顶层设计”的主导地位，也是多数汉族干部的亚文化和潜意识。一纸“自治空文”，没有法治基础，缺乏监督与纠偏机制，并不能有效保障合法权益。乌兰夫的教训是过于认真，甚至天真，深信延安承诺，执着于早年信仰，所以身受其害，直到晚年经历惨痛教训之后，才参透其中奥妙；

第三，通过东部土改与乌兰夫的遭遇，再次验证一个规律：即共产极权暴政，对治国人才实行倒筛选，“媚上紧跟”与“求真务实”难以兼容，不分民族。而“非我族类”的民族干部，就更加如此，无论如何忠心耿耿，都不会获得真正信赖。越有才干的民族干部，水平越高，政绩越好，其仕途也就越发凶险。

或许，这就是我们从内蒙东部土改的历史轨迹中，可以引申出来的三条经验教训。

注释：

1 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雷》，纽约：明镜出版社，2007年，第220—229页。

2 图门、祝东力：《康生与内人党》，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第2页，数字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34·6万人被关押，1·6222万人被迫害致死，8·1808万人致残；另有两种非官方说法：一是蒙古族学者巴赫的说法：逮捕关押了80万人，50万人致残，5万人被迫害致死；二是内蒙古大学编写的《内蒙古自治区史》的说法：2·79万人被迫害致死，12万多人致残。目前学术界比较公认的数字是：致死两三万，致残12万，关押50万。参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内人党事件>。

3 “单刀赴会”是指1945年10月，延安派乌兰夫去锡盟苏尼特左旗，解决那里出现的“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问题，周恩来称赞乌机智勇敢。后来，也泛指乌成功收服东部蒙古民族各派系。参见：乌兰夫革命史资料编研室编：《乌兰夫回忆录》，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251页。

4 这位特木尔巴根，跟我校书记同名，但地位更高，资格更老。1901年，特木尔巴根生于卓索图盟喀喇沁旗。1925年10月，进入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国际班。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45年8月，任内人党东蒙党部执行委员，1946年1月，任东蒙自治政府委员兼经济部长。1946年4月，参加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由苏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同年5月，任兴安省政府主席、兴安省工委委员。1947年5月，被选为内蒙自治政府委员兼经济部长。中共建政后，历任自治区财政部长，政协副主席，中央民委委员，内蒙高级法院院长。文革期间，受残酷迫害。1969年1月30日，死于呼和浩特狱中，终年68岁。参见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特木尔巴根>。

5 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内蒙古自治政府>。1946年3月30日至4月2日在承德召开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议上，以博彦满都、哈丰阿为代表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与以乌兰夫、刘春为代表的“中共延安派”，就东西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整合、如何实现自治、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未来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4月3日，确定了东西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合并，解散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停止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等一系列决议，史称“四三会议”。

6 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内蒙古自治区>, 刚成立时, 自治政府辖呼伦贝尔、纳文慕仁、兴安、锡林郭勒、察哈尔五个盟, 下设34个旗(市)、1个县, 总面积53·8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约200万, 其中约50万人为蒙古族。

7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9年, 第226页。

8 CCTV 央视纪录片《暴风骤雨·东北土改纪实》第四集“砍挖”运动, 2007年12月29日, 解说词, 来源:
<http://www.cctv.com/history/special/C20441/20071229/101546.shtml>。

9 《内蒙古日报》, 1948年3月21日第2版。

10 李鸿范、徐鹤京、丁修:《哲里木盟农村牧区的民主改革》, 见《曙光照耀哲里木》,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年, 第129页。

11 赛航:《内蒙古牧业区的民主改革》, 载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上), 第457页。亦请参考哈斯木仁:《解放战争时期内蒙东部地区的土地政策与土地改革》, 载《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3月, 第40卷第二期, 第20—25页。

12 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 香港:天行健出版社, 2010年, 第58页。

13 突泉县人民政府编:《突泉县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3年4月版, 第234页。

14 同注10。

15 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自治区史》,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1年6月, 第90页。

16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上),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1年, 第160页。

17 钱占元:《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乌兰夫领导牧区工作》, 载《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 2006年第6期。

18 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上海孤儿>。

19 新华社内参, 来源:《毒草集——乌兰夫反革命言论选编·第二集(1955—1964)》, 呼和浩特革命造反联络总部“批斗乌兰夫反党集团联络站”编印, 1967年10月。

20 引自网刊《蒙古新闻》http://mongoliinmedeel.blogspot.com/2014/07blog-post_23.html。

21 参见网文《草原精灵内蒙古黄羊哪去了?——天地自然志愿者内蒙东北考察记(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ec87b41a0102v2rr.html。

22 毛纯礼:《内蒙古积极调运粮食支援京津沪等地》, 新华社《内部参考》, 1960年4月27日。转引自《毒草集——乌兰夫反革命言论选编·第二集(1955—1964)》。

23 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雷》, 第441—442页。

24 王树盛等着《乌兰夫传》(1906—1988),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年, 第521页。

25 参见文革出版物《学习材料》, 1967年, 无出版单位, 无页码。

26 乌兰夫:《关于蒙文改革的讲话》, 1956年, 载呼和浩特革命造反联络总部“批斗乌兰夫反党集团联络站”编印:《毒草集——乌兰夫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摘编·第四集》, 1967年10月。

27 王树盛等着:《乌兰夫传》(1906—1988),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年, 第528页。

28 参见毛泽东：〈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全文，1935年12月20日，转引自《南蒙古时事评论》，http://smglnc.blogspot.com/2008/11/blog-post_1799.html。

29 乌兰夫未经中央批准，擅自变更内蒙党政机构，发生在文革前夕，我曾亲历。亦可参见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详见注32。

30 参见文革出版物《“当代王爷”乌兰夫反革命“宫廷政变”大事记》，无页码。

31 “前门饭店会议”大致过程，可参见巴彦泰着：《挖肃灾难实录》，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整理，网站：<https://www.smhric.org/IMPRP.pdf>。

32 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7月27日，以及1967年1月20日，内蒙党委请求华北局转发该〈报告〉，华北局1月23日请示中央，中央最终于1967年1月27日批转。文件可参见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152—164页。从华北局报告出笼，层层请示转发，到北京批转全国，中间有半年空档，什么原因？耐人寻味。

33 参见刘少奇、邓小平：〈与乌兰夫的谈话记录〉，原载内蒙古党委机关红旗联合总部编印的《文革资料》（2），1967年8月。

34 “内人党冤案”悲惨结果，参见注2。另见哈斯格尔勒：〈“内人党”冤案亲历记〉，载《炎黄春秋》网刊<http://www.yhcqw.com/34/4029.html>。

□ 来源：《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政治运动70年的历史回顾》，宋永毅主编，香港田园书屋2019年12月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